

街巷名中的经纬与数字

——老街旧巷话津味乡情之二十五

章用秀

清光绪二十八年(1902),袁世凯将直隶总督衙门设在今金钢公园和第二医院处,后又决定兴建一座新火车站,就是今天的天津北站。随之再修成一条由金钢桥通往新火车站的道路,称为“大经路”(今中山路)。不久这个地区便形成南北纵横、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,其南北向的道路与大经路平行,命名为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经路,东西向的道路命名为天、地、元、黄等多条纬路。那时,天津人将这个区域称为“河北新区”。

近代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此区域,有人还做过统计,这一带在现代至少与40位名人有关联,其中包括写武侠小说的宫白羽,教育家卢靖、章钰,还有中国首位女校长吕碧城等。

该区域内的房屋不同于老城里,也不同于当时的租界地,而多为中西合璧式,既具传统民族特色,又掺入一些西方的建筑符号,可明显看出当时西学东渐的印记。这里街巷的取名极有特色。其中,大经路的里巷多用“大”打头,如大成里(寓意大功告成,或学问、事业大有成就,或比喻太平无事)、大仁里、大义里(仁、义为传统道德的最高标准)等;二经路的里巷多用“二”打头,如二南里(取自《诗经》“周南”、“召南”二风)、二贤里(纪念古代名贤伯夷、叔齐)、二极里(南北两极)、二美里(取自《礼记·檀弓》“美哉轮焉,美哉奂焉”,意为“房屋华丽高大”)、二吉里(寓意吉祥、吉庆)等;三经路的里巷多用“三”打头,如三阳里(寓意三阳开泰)、三才里(旧时以天、地、人为三才)、三级里(寓意连升三级)、三益里(取自《论语》“友直,友谅,友多闻,益矣”)、三戒里(取自《论语·季氏》:“君子有三戒;少之时血气未定,戒之在色;及其壮也血气方刚,戒之在斗,及其老也,戒之在得。”);四经路的里巷有四维里(旧时以“礼、义、廉、耻”为国之四维)、四勿里(取自《论语》“非礼勿视、非礼勿

听、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动”),如此等等。觉悟社所在地就在三戒里,是老一辈革命家经常聚集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。

而天纬路的里巷多用“天”字打头,如天保里(“天保”为《诗经·小雅》的篇名)、天禄里(“天禄琳琅”为清帝藏书的地方)等;地纬路的里巷有地兴里等;元纬路的里巷有元吉里、元福里等;黄纬路的里巷有黄鹤里(传说仙人子安乘黄鹤云游各处),黄华里(黄华即菊花,取自《礼记·月令》“菊有黄华”)等;宇纬路的里巷有宇泰里、宇俊里,等等。另外还有泰来里(含《周易》“否极泰来”之意)、竹贤里(取竹林七贤之典)、依仁里(取自《论语·述而》“依于仁,游于艺”句)。

上世纪20年代,这一带又先后建起一些胡同里巷,其取名亦有文化

内涵,并多有名人足迹。如位于中山路中段西南侧的五昌里,1920年后天津造币总厂厂长刘梦庚在此建房成巷,取意“五世其昌”。达仁里距五昌里不远,同期达仁堂经理乐达仁在此建房成巷,1921年其在巷内开办达仁女校,教育家马千里为校长,邓颖超曾在该校任教。1923年邓颖超等在五昌里创建了我国早期妇女运动团体——女星社。

后来,很多旧街老巷为楼房所取代,只有三戒里等少数几处得以修复保留,有的则只保留了旧有的地名。其中有一处叫丰厚里的老胡同,笔者撰稿时仍在,其南起辰纬路,西北至五马路,长225米,均宽2米,最窄1.6米,平房,砖路,有纵横相交支巷3条。这个里巷中的房屋留有民国时的装饰风格,很有时代和地区特征。

●老城厢旧影

云林里

张建文并摄

位于老城里,北起张家大院,南转东至磨盘胡同,向南有二分支不通行,西侧通往碱台子北胡同。全长约210米,宽2.4米。该胡同始建于清同治年间,有富商刘某在此建有大院,并以刘家大院得名。1981年在地名普查时因重名变更为“云林里”。照片摄于2003年6月。



过大年,吉祥春联离不了,它在旧时也俗称春对、对子、年对。老天津人贴春联的同时还喜欢贴春条,相声大师马三立在《开粥厂》里提到年货时说“挂钱一百张,街门对、屋门对、灶王对、横批、福字、春条全份……”

“春条”一词本指春日花木的枝条,宋代诗人杨备早有“春条拂岸柳如金,一鉴澄空照底深”之句。后来,百姓将一些随意随心的红纸条也比喻为春条。春条也算得上是春联的姊妹,可贴在院门口、影壁、轩厅堂榭、炕头等处,是老天津人过年的必备。

写春条,用的红纸一般约三四指宽,小短条长半尺左右,大长条长可三四尺,书写的內容多是吉祥话、顺口溜之类,皆为美好希冀与真挚

祝福。春条的写法不见得像春联那般讲究格律平仄,春条更显活泼之气。比如一句四个字的,或四句十六个字的,甚至更多。四字春条的词如“金玉满堂”“日进斗金”“出门见喜”“阖家欢乐”“喜庆大来”“开门

过年贴“春条”

温暖

大吉”等。四句十六个字的春条常以“宜人新春”或“宜人新年”四字为开头,比如写“宜人新春,福在眼前,阖家欢乐,人口平安”;如写“宜人新年,年喜相连,连生贵子,子孝孙贤”等,不一而足。有时为了与后面的

句子字数相配,也会在“宜人新春”后适当加几个字,如“宜人新春乐”“宜人新春万象新”“宜人新年春光好”等,后面接“白面饺子豆饽饽,酸白二菜炒得好,黄白二酒随便喝”,或写“财神炕上坐,出门就见喜,五谷垛成垛”之类,喜庆之气不胜言表。

过去的大宅门、老商铺更讲究贴春条,常规的红纸手写之外,有的还会采用木刻、烧瓷、织绣、砖雕等艺术形式来制作春条。后来,春条的词句也多有时代色彩,比如20世纪八十年代末涌现出“宜人新春乐无边,改革大道宽又宽”“人民币装满箱”以及“粮食堆成山”等词句。现下,红红的春条已不如昔日普及,偶尔望见的“抬头见喜”“出入平安”等红纸条尚遗存着旧民风。

旧津的医药研究会

曲振明

近代天津曾出现过医药研究会,反映出彼时天津中医界在不断改革、追求进步。1907年,在著名中医丁子良的倡议下,成立了天津医药研究会,会址在北马路。研究会提倡中西医结合与中医药改革,活动内容包括“演说”“实地研究”“讨论治法”“分析研究”等。1910年天津发现鼠疫,研究会遂推动了“防疫保卫医院”的成立,并在防疫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。进入民国后,研究会活动逐步停止。

1929年,著名中医孔麟台等成立新的天津医药研究会,提出“以国有医药为主干,而实欲冶中西医于一炉,按部就班,逐渐改进,中医仍应力图进步日新”。1933年,大量难民涌入天津,该研究会组织会员成立救济队,深入东局子、小王庄难民收容所为难民施诊舍药。1937年天津沦陷后,研究会停止活动。

遂闲堂女画家

定轩

张玉贞,字蕴仙,清末人,遂闲堂张氏后裔。出生前,其父母同梦灯花五色,大如车轮。张玉贞自幼聪明好学,邻里莫不称其贤淑。及笄,求聘者多,玉贞誓不出嫁,以养父母。其父歿,张玉贞送殡后刺血写《金刚经》。

张玉贞多才多艺,“喜抚七弦,善行草书”“诗之精炼,琴之雅操,绘事之与书法,皆极工妙”。有《作画》诗曰:“给得人间翰墨多,寸阴不敢等闲过。匆匆妆罢芸窗坐,任取旁人笑画魔。”她的画简洁明快,不着重彩浓墨,一棵白菜,几只飞蝶,渔翁,乞妇,信手拈来,淡淡几笔,自然成趣。她曾画有《钓罢归来图》《木兰从军图》《海翁携杆图》《乞妇负猴图》等。

她的画多有题诗。如《题海翁携杆图》云:“背着葫芦策杖行,是仙是隐不分明。形骸忘却须眉在,何待旁人问姓名。”又如《题竹筒蛱蝶白菜图》云:“蛱蝶自飞扬,超凡学老庄。繁华看已淡,惟有菜根香。”

《天工开物》说船

吴裕成

明崇祯十年(1637),宋应星的科技著作《天工开物》付梓。书中《舟车第九卷》:“游海滨者得见洋船,居江渚者得见漕舫。若居趣山国之中,老死平原之地,所见者一叶扁舟、截流乱筏而已。”有言古船今船,名目百千的宋应星,归纳出三大类:航海的洋船、沿运河而行的漕船,以及山国平原的舟筏。

宋应星接着写道:“京师为军民集区,万国水运以供储,漕舫所由兴也。元朝混一,以燕京为大都,南方运道由苏州刘家港、海门黄连沙开洋,直达天津,制度用遮洋船。”本是说运河漕舫的,却要从元代海运的遮洋船转入话题,因为这样的漕粮运输,明初依旧,都是海船“直达天津”,然后续以河运。宋应星写道,永乐年间改为运河行漕,平江伯陈瑄“始造平底浅船,则今之粮船之制也”。这种漕舫,“初制底长五丈二尺”,后来“运军造者私增身长二丈”,载米量由“近二千石”增至“可受三千石”。这样的大船,可以直达天津。说起来,河面上遮洋船、漕舫都曾驶过的地方并不多。天津见过这世面,因为是航运枢纽。